

中国政治的话语生产

——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会通的思想实验

商红日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并超越现代性困境,则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处理并超越现代性困境,必须处理和超越知识逻辑的一统性,探寻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的会通机制。如果中国政治学即研究者立足学术立场来研究中国政治并形成学问,那么,发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事件,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实现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的会通,在运用话语生产机制形成事件的总体性的研究中,创造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这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关键词 中国政治 话语生产 知识逻辑 智慧逻辑

商红日,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200234

一、日常生活事件及其话语生产

日常生活曾被吉登斯的“结构化”论说机械地理解为“重复”和“惯例”,强调其“经验在时空中的构成”的特征。吉登斯说:“日常”(day-to-day)就是“只有在重复中才得以构成”^[1]。但是,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真正影响人们对日常生活理解的,并非是年复一年每天重复的“惯例”,而是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对中国政治而言,理解与阐释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围绕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事件,组成一个个虚拟或真实的“村落”,构筑起一个一个舆论场,形成一个个话语中心。由具体事件引出的关于事件的命名、定义、描述、评论、引申、转义、转译、讥讽、思想观念、论说、传播乃至修辞等,构成话语生产的诸多机制。这是可以按照谱系来区分的多重话语生产机制。日常生活——事件——话语生产,提供了一个理解现实的契机与通道,也为学术研究敞开了一扇大门。

但是,话语生产过程既是解读生活的过程,也是构建生活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或者说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日常生活才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而其中的事件也就具有了实践性、历史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6AZZ04)阶段性成果。

[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页。

性和文化性。循着这一思路来展开与深化日常生活事件的思考,探讨日常生活事件与话语生产的关系,我们有可能重新发现我们真正的研究对象,有可能重新找到真正能够指引我们走出困境的路标。

话语生产不是修辞的“琢磨”或制造,尽管“如果要使理性拥有力量并发生影响,必须始终加上雄辩术的说服力”^[1]。当然,话语生产也不同于话语分析,尽管话语分析者“在对现代化现象进行研究时,也既不从了解所谓支配着这一现象的那些‘客观规律’入手,又不从建构了这一现象的那些行动者们的主观意义世界入手,而是主张从对人们以话语形式建构这一现象时所采用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入手,来达成对这一现象的理解”^[2]。话语生产面向生活实践,抓住日常生活事件,并通过对事件的研究来生产学术话语。

中国政治的话语生产指涉学术自主自立与自为性,并非主观刻意寻求学术的集体“特立独行”,而是从“负现代性”^[3]的绑架中实现解脱,辨析中国问题的特质,生产符合事件本真性的解释话语和理论逻辑。

二、现代性治理工具的缺陷

现代性是一种极强大的解构力量和促发机制,因此,除非某种抵御的文化信仰足够强大,否则,现代性可以在十分短暂的历史时间单位内,解构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社会结构、行为模式与各种制度,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无论其正面性还是其负面性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效应,人们很少反向思考其缺陷,即使有诸多反思性论说值得对其深省,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对此采取认真的立场和态度。现代性治理工具的缺陷是负现代性的重要体现。由于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人们按照惯性依然会在现代性治理工具库中寻找治理之方,而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会陷入固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研究负现代性问题,应从破解现代性治理工具的缺陷开始。这里集中讨论其中的三种主要缺陷。

现代性中的理性思维无疑是首先应予以正视的问题。现代性治理工具的首要缺陷即理性依赖。正是现代化对理性的倡导、运用和激励,致使人们无法不日益依赖理性的力量;而随着人们对现代化成果地分享,现代化过程强化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念,因而,人们主动去探寻与运用理性来完善自己的行为。历史地看,现代化在现代性刺激下萌发和发展,却在自身的惯性中滋润着现代性的成长。理性思维就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之一。

何为理性依赖?这是一种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固化为基本原则并成为惯习的思维与行为特征。在现代治理活动中,虽然理性不是工具本身,但所有的工具都不能脱离其理性的本质。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首先是社会的“单向度”趋势开始初露端倪,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工业与商业乃至新兴产业如服务和信息业等的生产方式,无不纳入该种理性范畴;其次,作为对这样一种“必然性”的信念,该种理性逐渐意识形态化,自我合理性的辩护能力大大提升的同时,排斥性的能力也得到极大增强;再次,知识精英内部的分裂不可避免,因为知识界在研究中的分歧在上述特点的作用下,形成共识的能力不断弱化,而扩大分歧,并使其“原子化”、“小团体化”的能力不断增

[1][英]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加丰、郑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谢立中:《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3]这一用语旨在强调现代性的“双面性”,并将话语生产聚焦于对现代性的负面性展开研究。这一研究不同于后现代的批判,也不同于从“正向”角度为了克服现代性的缺陷所进行的研究,而是分离现代性,视“负现代性”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以此为研究对象。

强,致使多种“单向度”而非一种“单向度”生成,特别是,马尔库塞式的单向度被转化成中国式的单向度^[1],这种状态将影响着社会情绪的形成、主题的凝聚与提炼、舆论之间的博弈等等;最后,在需要理性的地方,却出现理性化程度不足的情况,致使明显不合理的事情时常发生,导致治理困局,特别是治理的活动不断蜕化为“剧场”活动,真实生活的真实逐渐演绎成为“剧场性”的真实。

现代性治理工具的另一重要缺陷是主体失灵。在现代治理活动中,人们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术语及其理论几乎耳熟能详,但主体失灵可能是人们没有或很少考虑过的问题。在后现代哲学话语中,主体早已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后现代哲学的旗帜性人物福柯,在其主体的批判中已将主体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这里当然不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来讨论主体失灵问题,只是提请人们注意:当我们拿起各种治理工具来应对需要治理的事务时,主体的诸多缺陷不幸被后现代理论家言中。今天,我们面对越来越增加的不确定性风险,必须重新思考和塑造主体以解决现代治理活动中的主体失灵难题。

所谓主体失灵不是泛指作为哲学范畴的主体失去与客体的关系对应性,从而导致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的破坏。所以要首先澄清这一点,是因为后现代思想家和试图完善现代性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等,他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即都混淆了哲学主体与实际生活主体,因此,他们都失去了正确找到破解难题的机会。这里的主体失灵指现实实际生活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人的缺失,以及在场的主体其主体性的丧失。由于这两种状态的存在,导致主体的“空场化”和“空心化”。

现实实际生活中的主体不是一种哲学规定,而是在生活的内容及其方式影响下产生的、既为生活所塑造也直接影响生活的人。因此,这里的主体是十分具体的和多样化的。主体失灵指的就是这样的主体的状态:一方面,体制性治理主体经常实际上处于空场状态,因为他们外在于这里的实际生活,体制性责任或知识性使命将其置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真正的主体已经被客体化了。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人们看到的首先是责任主体逃避、知识主体纷纷评说,各论其道,但真正的主体却处在客体位置,他不能以主体的身份讲述;当日常生活被高度程序化、技术化以后,生活的内涵被这些程序、技术所覆盖,许多事务的处理、许多工作的展开,许多公共性的活动,越来越停留于程序终止的地方,其中活动的人逐渐失去其主体性,而演变成为一个“程序员”。

这样一来,治理的风险已经无处不在了。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治理主体缺位,这也是主体失灵的最主要表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现代社会命名为风险社会,这个风险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3]。人们虽然早已意识到风险的严峻性,但在如何解释和解决风险的问题上,却出现了“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断裂和缺口。”^[4]他提出了“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尝试在理论上解决用

[1]马尔库塞在其著名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的著作中,分析发达的工业文明内生出了这样一种社会控制机制:自由已经蜕变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工业社会不断创造需求,致使“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他们的灵魂困在他们的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之中。”社会差异似乎被同一消费所消弭,因而形成了一种人们愿意接受这种社会控制的状态,个人与社会之间出现了“直接的、自动的一致化过程”,因此,发达的工业文明的社会是单向度的社会。由于这种单向度社会是由“高级的、科学的管理和组织”所创造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内在的否定性、批判性思考能力不断弱化以至于丧失,各种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这种灌输和操纵已经不再被人们认为是外在的,而被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来认同和接受,于是,单向度的社会状态致使单向度的思想和单向度的人出现。本文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概念称之为“马尔库塞式”,意在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些状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已显现,但在中国,却又受到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例如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非左即右、非民主即极权、非国家即私人、非法治即人治等等两极对立思维,成为中国式单向度。

[2][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6页。

[3]引自《风险社会》第一部分的题目:生活在文明的火山:风险社会概观。

[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新的现代性”改造“旧的现代性”，克服“组织化不负责任”的现代性困境。但他没有将主体问题置于核心位置，因而，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依然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之路。主体失灵是远比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危害更大、更甚的现代性问题。因此，现代性治理工具的缺陷中，不能没有主体失灵的清单。

现代性治理工具的再一个重要缺陷是制度模拟。制度模拟，也可称之为制度仿造或制度模仿。人们通常以“共性”、“借鉴”、“学习”、“科学移植”，乃至“专业化”、“创新”等概念为制度模拟提供合法性论说的逻辑。治理制度是否一定是内生的？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治理制度的核心要素必须有内生性，这是无需置疑的。这就是说，治理制度不能简单模拟。何为治理制度？其核心要素是什么？核心要素为什么必须具有内生性？显然，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应有明晰的答案，否则，制度模拟问题不能说明白。

为此，这里必须首先就新制度主义做些讨论，因为问题由此而引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盖伊·彼特斯总结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关于制度的阐释，概括了制度所具有的四大特征，即结构性、稳定性、约束性和价值与意义的共享性^[1]。其中，第四个特征即价值与意义的共享性存在着重要争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将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视为反应式的关系，作为理性的动物，人们假定个体会对制度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做出反应。因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变迁看得比较简单和容易，只要预先设计好能够改变人的行为动机的方式，“行为几乎立刻就会发生变化”^[2]。但是，以马奇和奥尔森为代表的运用规范方法来研究制度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则形成了不同的论说。该派认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偏好与意义是通过各种教育、灌输和体验形成的。它们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外生的”^[3]。制度和社会各自有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而非反应式的主从关系。这就意味着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的共享发生于制度与社会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中。

在公共事务治理的问题领域，国内学界的研究乃至治理实践均偏好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点。应该说，新制度主义各派都是作为对西方行为主义反思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既具有西方历史文化的总体特征，也具有特定时期西方社会问题的针对性，因此，其理论论说的局限性在各个流派中都是存在的。但如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来研究吸纳新制度主义中的有益成分，还是应该对其不同流派有所甄别和选择。尤其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中国问题相距更远。

如果说新制度主义是在基本理论层次展开的理论创新的结果，那么，治理制度即把新制度主义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事务治理实践而产生的制度创新的结果。政治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此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具有代表性。简单地说，治理制度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实践结果。治理制度的复制，在组织理论中也被称作为“制度同形性”，指的就是制度的复制或模仿，是组织“按照其他组织的形式塑造自己”^[4]。一般说，由以下三个方面因素所导致：一是外在的权威性强制，例如重要法律制度变化，致使相关制度在各种组织中复制；二是基于环境不确定以及组织技术难以应对来自环境不确定的风险时，致使组织从标杆组织那里复制其制度；三是现代职业规范促使专业差异被

[1][美]伊·彼特斯：《制度主义：新与旧》，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

[2][美]伊·彼特斯：《制度理论：问题与展望》，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57页。

[3][美]詹姆斯·G.马奇、约翰·P.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4][美]保罗·迪玛乔、沃尔特·鲍威尔：《组织领域中的制度同形性与集体理性》，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页。

普遍规范所统一,如大学里的教师存在广泛的专业领域差别,但却可以由统一的大学制度规范,致使制度复制普遍存在。

但是,制度复制的复杂性日益被简化的过程所遮蔽,特别是,这种简化过程也是制度的价值元素或核心元素逐渐被“筛漏”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制度模仿变得低成本和具有速成性,因而,一种治理制度模拟现象大面积出现。这种制度模拟的主要缺陷是:模拟的制度就如同是一个预制的建筑材料,由于它不是在原地浇筑,因而它与那里的建筑物并不契合。这就是说,制度并没有在这个场地中生产出来,缺少生命活力和制度应有的意义,因此,其内生元素缺乏。这样的制度必然存在合法性、效能性和效力等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制度几乎全部要依靠一种外在力量使其运行,这个外在力量即某种权力意志,因此,制度模拟的结果是制度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制度本身并无力量。

如果上述三种主要缺陷分别出现于治理活动中,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通常情况下,这三种主要缺陷同时出现,从而,造成了现代性治理工具的系统性缺陷,由此就带来了矫正的难度。当然,分析、揭示现代治理工具的缺陷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是否定其全部意义。只是,人们需要把握它的缺陷,并能够修正它们;尤其需要在深入认识其缺陷中,创造出更富有活力、更接地气、更有效的现代治理工具。

三、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

知识逻辑发轫于古希腊,它与现代知识逻辑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个课题需要专门研究,这里限于本文主题,直接讨论现代的知识逻辑。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也是知识逻辑的简明说明。“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的哲学名言,也是知识逻辑的另一种简明说明。前者强调了经验与归纳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后者强调了理性与演绎的获取知识的途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相伴而行,工匠和学者“引起一个爆发性的联合”^[1],最终致使知识逻辑成为现代性的代名词。知识逻辑为人类行动提供合理性的最终根据。因此,只有表达知识的规则才是规范;只有能够形成为知识的理性才是理性;只有理解知识、创造知识、运用知识的人才是主体。随着19世纪、20世纪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知识逻辑已经一般地成为“理性逻辑”或“科学逻辑”,其简化形式为“因果逻辑”。这个逻辑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缺陷和局限,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2]。如何在合理性中祛除其不合理成分,就成为研究、分析、借鉴知识逻辑的关键要素,尽管这是十分艰难的任务。

智慧逻辑同样为人类行动提供合理性的最终根据。但智慧逻辑与知识逻辑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知识逻辑的总前提为“知”。“知”即“知道”。“知道”并非是对“不知”的否定,而是对所知之物的本体确认过程。尽管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中,关于“知”与“真”的关系、关于“知”与信念的关系、关于“知”与“证据”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论争从古希腊持续到现在,但这些复杂的论辩都不影响知识逻辑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的显现。智慧逻辑并非是因果逻辑,从而,也不能用知识逻辑来理解或解读。正如清末学者刘思白在注解《周易》时所言:“若注古书,把古时的制度习俗全都撇开,强用新学说牵引附会,恐削足纳履,必至越发无有头绪。”^[3]同样的道理,如果按照知识逻辑的思维来重构中国古代的思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3][清]刘思白:《周易话解》,龙若飞校点,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想、观念、文化、旨趣,也就不能再视其为古代的思想、观念、文化、旨趣等等,而转换成为另一种言说了。智慧逻辑是对应逻辑,即行动者在事物对应关系中表达意旨。从有限对应关系的确立,到对应事物的无限生发转换,形成基本的宇宙观、人事观;有对应的事物存在,就有智慧逻辑的意旨。意旨的核心是寻求建立对应事物之间的平衡关系。《周易》中的智慧就是智慧逻辑的重要形态。“阴”“阳”对应生发出天、地、人的对应,进而转换出无穷多样性对应关系。人间事物在复杂对应关系中变化,而人事的道理,即各种各样平衡关系则蕴含于对应的事物及其变化关系之中。

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的差异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例如,神和人的关系,在知识逻辑中必须作为因果关系来理解,而在智慧逻辑中必须作为对应关系来理解。在前者的理解中,神与人始终是“同体”的:其中,早期的理解是,神作为人的伙伴,就生活在人们中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敬仰神,是因为神就在现实生活里,甚至在理念上说人可以变成为神。基督教产生,神人更加同体化了。对上帝的信仰,意味着将上帝及其精神置于心中,从而在来世才可以获得神性(进入天国)。启蒙以降,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取代了神的位置,这时,曾有启蒙学家预言,宗教即将终结。“就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看,英国神圣的自由思想家托马斯·伍尔斯顿(Thomas Woolston, 1670-1731)最先定了个日期,说到时现代性将战胜信仰。他在1710年前后的著述中很有信心地表达说,基督教将在1900年前消失”。半个世纪以后,伏尔泰在一封回信中说,“宗教的终结将在50年内到来”^[1]。但是,宗教信仰在知识逻辑的作用下,转换成为“宗教资本”,成为表达宗教情感的符号和仪式,而这些宗教资本能够成为一种重要“投资”^[2]。神与人的关系由过去的现世与来世的精神关系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关系,神性最终被人性取代,神、人在现代性的物化运动中实现了一体化。与此不同,智慧逻辑理解神与人的关系,始终是作为两个世界来定位的。这两个世界各自有其独立的秩序和规则,并形成对应关系,其中,神始终是外在于人的世界的力量。人们敬畏神,只在于祈求神的力量力的庇护,可谓“凡间千般事,皆需神照应”,从求财求嗣、祈求风调雨顺,到趋福避祸、消灾去病等不一而足^[3]。

再如,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知识逻辑行事的人类,在面对自然时,强调人的力量,特别是强调拥有了知识的人的力量。因而,人类可以向自然无限地扩张,只要人类所掌握的关于自然的知识足够丰富。正如美国哲学家、生态学家大卫·雷·格里芬所说,所谓现代文明,以16-18世纪新教改革和理性主义启蒙为其文化形式,可以看作为一个“巨大文化工程”,“这一现代工程所展示出的最终目的是将人类从自然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它最终追求的(即使最初并不很明确)是建立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科学世界。科学及其技术手段成了现代的世俗宗教,其目的在于释放普罗米修斯般的能量,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并取消所有的自然限制。”^[4]总体说,知识逻辑对自然的根本态度是“外向的”。与此不同,遵循智慧逻辑,人对自然是“自敛”的。在智慧逻辑中,自然始终是与人类对应而独立存在的,自然与人的关系作为和谐关系来确定。而“天人合一”的智慧思想则是对这种和谐关系的高度解读。人对自然的自敛性,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行事方式,乃至当今处理国际事务、公共政策及发展理念等方方面面。例如,就发展理念来说,知识逻辑的发展理念以不断激发人类享受更高级文明的愿望为机制,试图通过满足人类不受约束的物质欲望而推动人类索取能力的不断提升和竞争。这就必然不断释放人的能量来争夺自然界有限的资源,这在文明的意义上,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正是前引文中所说的“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的一个注解。智慧逻辑蕴含着有限发展理念。在

[1][2][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1页,第156页。

[3]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02页。

[4][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事物的对应思维中,始终有对应物在场,哪怕是未来的人们。因此,对于还未来到人间的现在不在场的未来人类而言,只有智慧逻辑是最合理的、最具正义性的。

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也是各有自身的缺陷的。就知识逻辑说,由于它很难承认其他逻辑的合理性,依靠知识逻辑的思想与实践,其基本的路线是运用知识逻辑统一世界,因而,知识逻辑的文化不易得到其他文化的认同,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文化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一时陷入茫然,不知道对手在哪里。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似乎又是找到了新的对手。但亨廷顿没有搞清楚,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文化的冲突,实质上是知识逻辑与非知识逻辑的冲突。倒是有的欧洲的学者采取了更明智一点的立场,呼吁西方世界放弃“冲突”观而采用“对话”与“合作”观念,强调“必须学会从其他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1]。遗憾的是这样的学者也是依然固守知识逻辑的思想轨迹来分析当代世界走势,难免落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当然,在中国学术与思想界,知识逻辑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地在显现,人文价值的话语权日渐旁落,以致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实质正义”逐渐流失。智慧逻辑同样也是存在缺陷的。诸如认知上的模糊性、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自我合理性论辩的空间过大等等,这些重要缺陷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它们会对现代制度的实现与公共空间的规范化,形成很大的负面性制约。

世界的事物纷纭复杂,特别是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而言,认识和解决复杂的事务,相应需要有不同的逻辑,尽管各种逻辑都有缺陷。知识逻辑和智慧逻辑为中国政治话语生产预设了两个基本的文化场。

四、中国政治话语生产的文化场

我们将中国政治话语生产的生活实践的时间与空间定义为文化场。这里的场概念来自于对布迪厄场概念的改造性使用。布迪厄在《实践感》、《帕斯卡尔式的沉思》等著作中,将场的概念定义为“游戏场”,“也就是游戏空间、游戏规则、赌注,等等”^[2]。布迪厄将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置于各种游戏场景来描述,增加了生动性和直观性,并且也不失对话语空间的拓展。但游戏一词在中国语境下,有时会作贬义理解。即使在一般意义上,也是指娱乐性、体育性活动,不易直接使用。由此,对场的概念要做一定的再界定。这里赋予场的概念以时空内涵,是能够产生故事的地方,也是积累并贮存故事档案的地方。文化场是人们的有意识的、形成意义的活动过程及其范围,即人们的生活实践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仅仅给出这一解释,并无太大的意义。中国的文化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甚至是十分简单的单一时空存在。两种基本的生活逻辑——知识逻辑和智慧逻辑同时在场,它们或并置、或博弈、或纠结、或镶嵌、或覆盖,通常由事件而引出不同话语表达。于是,场的文化意蕴和实践意蕴凸显,这使得文化场概念具有了重要功能。例如,反腐败构成为一种事件的总体,在这个具有总体性的事件中,运行着两种逻辑:一是知识逻辑,即腐败是肌体腐烂而必除之,这就是反腐败;二是智慧逻辑,即反腐败存在“标”与“本”的不同治理方式,这也是反腐败。这两个逻辑是不同的,但它们却是相融和镶嵌的。用好两个逻辑,方能在中国真正治愈腐败顽疾。再如,某市市民聚集起来反对在该地建造可能带来严重环境问题的某个工程,构成为一种事件。在形成为事件的这些市民的行为中,包含着生活安全的意义诉求,但也可能包含着其他意义诉求。运用知识逻辑来解释这种事件,人们会寻找诸如此类的一些事件,将其类型化,然后分析其中的各种可解释的要素。运用智慧逻辑来解释这个事件,则首先确定其

[1][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郗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2][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对应性:哪些人,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什么标语口号、要干什么、持续了多长时间;导致什么结果、影响如何等。两种不同文化场为事件的研究确定了不同的理路。

文化场对于政治话语生产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概言之,其意义主要在于经过命名与定义的话语生产机制而形成事件的总体性。日常生活事件,每一件都是具体的,事件之间不一定都存在共生性,甚至它们并不存在什么联系。但在一定的文化场的作用下,通过命名与定义等话语生产机制,却使空间上具有散布性、时间上非共时性的事件,形成总体性。其中,对事件的命名与对命名话语的定义是基本的机制,其他一些话语生产机制如传播、转译与转义等,都是在这两种意义形成后发生的,虽然这些机制都需要深入研究,但从文化场的存在意义上说,命名与定义更具有根本性。

如上文所述,事件能够引发出话语表达,因此,事件即陈述对象。但这个事件与福柯《知识考古学》所论的“话语事件”有一些区别。《知识考古学》中的“话语事件”是一种话语分析的概念,具体指在“话语的形成”的“散布系统”中,某一“陈述”如何演化而成为“事件”的过程,“这种分析所特有的问题,我们可以如此提出来:这个产生于所言之中东西的特殊存在是什么?它为什么不出现在别的地方?”^[1]所以能够形成如此追问,来自于追问的对象,即某一陈述本身,由其引起,围绕其展开,由此,话语本身就具有了事件性质。发生于本文所指的文化场的事件,不同于福柯的话语事件,区别是:在福柯那里,话语在先,话语为研究对象;而本文这里,话语在真实的事件之后,事件才是研究对象。事件是指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状况:事情的原委、演化、参与者、影响者、结局等。这样的事件,总是要给予一个称呼,即命名;命名所具有的含义可能是简单的、直接的,也可能是复杂的、容易产生歧义的。这样,如何定义其含义,就关涉事件本身:它何以发生、它的性质、程度、意义、范围、类型、层次等等。

以治理的话语生产为例。治理由不同文化场的话语生产给予了不同的总体性。在知识逻辑中,治理是对国家主权的解构,也是对超越国家的权力建构。但必须告诫人们:治理是解构谁的国家主权,权力建构要超越什么国家。在知识逻辑下,全球治理“是根据西方国家的理念所建构的,其本质是维护西方核心利益与主导地位”^[2]。由此,对西方国家而言,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观念及其国家制度是对治理的最大挑战,用治理来解构主权,并建构起体现西方价值的超越国家的权力,这就是其治理的要义。这个要义是对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各种事件的总体性的揭示。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的确定的命名与定义,生产出一整套治理的话语。但智慧逻辑赋予治理以不同的总体性。它引导知识逻辑在主权之下再建构,瓦解由知识逻辑所形成的解构能量,确立起上下合作的逻辑前提和基础。而当这个前提和基础扎实稳固建立起来,全球治理将生产一整套新的治理话语。智慧逻辑的先导性、超越能力成为处理好知识逻辑和智慧逻辑的关键要素,也是两种不同文化场的关系的生动演绎。

如果中国政治学即研究者立足学术立场来研究中国政治并形成学问,那么,发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事件,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实现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的汇通,在运用话语生产机制形成事件的总体性的研究中,创造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这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责任编辑:史拴拴]

[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页。

[2]朱云汉:《王道思想与世界秩序重组》,[北京]《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2辑。